

胡明扬 语言学论文集

(增订本)

HUMINGYANG
YUYANXUELUNWENJI

胡明扬

著



商务印书馆

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

(增订本)

胡明扬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胡明扬著. —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7-100-08401-7

I. ①胡… II. ①胡… III. ①汉语—语言学—
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297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UMINGYANG YUYANXUE LUNWENJI(ZENGding BEN)

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增订本)

胡明扬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401-7

2011年7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1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6½

定价: 35.00 元

增订本序

我这个人常常被认为是“非专业”出身。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西洋文学，英文系毕业。那么我主要研究的是不是西洋文学？好像不是。那我的专业是不是汉语呢？好像也不是。所以，我常常遭到误解，认为我是学文学出身，不懂语言学。虽然没有系统学过《说文解字》、《尔雅》等古籍，但是我对中国古典的东西非常有兴趣，这可能与我爱好古典文学有关。后来到了人大，当了教研室主任，正值教研室没有任务，我便组织大家编写《词典学概论》。虽然没有编过辞典，但是联合国辞典学家编著的《词典学概论》中译本，是我校对的，也算是一点经验吧。此外，我还仔细阅读了《简明英汉辞典》、《简明牛津辞典》以及《法兰西学院辞典》的前言部分，并且进行了翻译，这也是词典学的一部分。为了学词典学，我还做了一项十分具体的工作，在吕叔湘先生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试编了一个长条，那便是对“打”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我搜集了 6000 多条关于“打”的例子，梳理了从东汉到现代各个不同时代“打”的意义，分成 100 多个义项，最终写成了《说“打”》一文。除此之外，还要感谢国家辞书研究室的方厚枢先生。听说我们要编写《词典学概论》，他便将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经国家通过的辞典编纂的凡例、计划、体例等所有档案资料都赠予了我。没有他的大力支持，也没有我们日后的《词典学概论》。出版若干年后，商务印书馆的张万起先生曾与我讨论过改编事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至今遗憾。

我早年在私塾里面念书，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也学过一

点最基本的语言文字学,也就是所谓小学吧,至少读了一些古书,《论语》、《孟子》也都是从头到尾地背过。这些东西不能丢。在王国维先生的纪念会上,我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重视。这可能是因为我的那篇文章区别了什么是“国学”,什么是“汉学”,什么是“中国学”。商务印书馆决定为我 2003 年出版的论文集出个增订本,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在这本书里,我想把我过去学过的这些东西,或者写过的有一定影响的文章选来放在这里头。至于将来,如果继续有各个方面的写作,那就以后再补。

胡明扬

2011 年 5 月 30 日

原 书 序

如水流年，从 50 年代初到现在，一晃就是半个世纪。陆陆续续写了一些东西，可是杂而不精，这就是半路出家的毛病。不过我遵循吕叔湘先生的教导，还肯在搜集材料方面下点笨工夫，所以也许还有点参考价值。碌碌无功，只能怪自己不够努力，偶有所得，完全要归功于吕先生早年对我的教导、支持和提携。我无缘得列吕先生的门墙，但是一直认为是吕先生的私淑弟子。一个语言学的门外汉，没有吕先生的指点，恐怕永远也进不了语言学的大门。

吕先生当然不能教我语言学的 ABC，他主要教导我事事处处要严谨、谦逊和与人为善。吕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是身教重于言教。至于我究竟学到了多少，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但是我不敢不读前人和时贤的著作而空发议论，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不敢把外国人的创见窃为己有，不敢妄言菲薄他人，这些都是吕先生谆谆教导的结果，因为我始终忘不了我第一篇文章正是大批判风格的文章。是吕叔湘先生教导我走上了正道，把我领进了语言学的大门。吕叔湘先生的道德文章将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不过，高山仰止，要真正学到手又谈何容易。

我常常在节假日还想去看望吕先生，可是又一想，吕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不禁潸然泪下。

1990 年吕叔湘先生曾经为我写了我当时准备出版的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当时没有用上，我一直珍藏至今，这次用上先生的题签，那么这本选集也算是我这个未列门墙的学生给老师呈上的作业吧。

胡明扬

2001 年 4 月

目 录

理解和宽容——祝贺《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二十周年	1
中国语言学 21 世纪展望	11
中国语言学一个世纪的回顾和展望	23
语言理论和语言理论研究	36
海盐通元方言的代词	41
海盐方言的人称代词	55
海盐通元方言中变调群的语法意义	59
海盐方言的存现句和静态句	72
海盐方言的动态范畴	78
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	89
北京话的称谓系统	102
北京话“女国音”调查(1987)	112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	123
《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 ...	142
《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通考》对音	157
说“打”	172
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	211
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	220
再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	232
语气助词的语气意义	244
流水句初探	250

语法意义和语汇意义之间的相互影响·····	261
句法语义范畴的若干理论问题·····	269
语汇研究和语法研究·····	285
语体和语法·····	292
语义和语法——祝贺《汉语学习》出版 100 期 ·····	297
语义语法范畴·····	306
基本句式和变式·····	310
单项对比分析——制订一种虚词语义分析法的尝试 ·····	317
说“词语”·····	330
关于“名物化”问题·····	347
形容词的再分类·····	358
语法例证的规范性和可接受性·····	368
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 华诞 ·····	371
规则化 系统化 计量化——当代语言学的特征 ·····	380
汉语词类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387
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统计方法·····	405
北京话社会调查(1981)·····	417
70—80 年代北京青少年流行语 ·····	444
语言和方言·····	454
刘复《中国文法通论》读后·····	461
现代汉语语法的开创性著作——《新著国语文法》的再认识和 再评价 ·····	470
陈望道先生《文法简论》读后·····	486
混合语理论的重大突破——读意西微萨·阿错著《倒话研究》·····	495
国学、汉学、中国学·····	503
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	511

理解和宽容

——祝贺《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二十周年

世纪之交很可能是中国语言学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从比较单一的理论、方法和思路转向多种理论、多种方法和多种思路的一个转折点,并且有可能为创建反映汉语特点的语言理论和方法开辟道路,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多样化的趋势在 80 年代后期就已经出现,到 90 年代更为明显。但是从总的来看,借鉴国外 50 年代以后兴起的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尝试才刚刚开始,并且还只有少数人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多数人对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还不很了解或者很不了解,所以要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来比较全面地描写和解释汉语语言事实,要使这些理论和方法充分中国化,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目前国内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的多数学者比较熟悉的仍然只是传统语言学和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传统语言学和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多方面应该充分肯定,并且大部分理论和方法已经充分中国化了,而且今后还是描写汉语语言事实的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局限性,特别是当这种理论和方法发挥到极限的时候,局限性就更加明显,因此就有新的理论和方法取而代之,或另辟蹊径。这是科学发展史的常规,如果不是这样,科学就会停滞不前,不可能发展了。在国外,50 年代以后,各种语言学学派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以生成语法为代表的形式学派和以功能语法为代表的功能学派,还有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但是这些新兴的学派都或多或少吸取了传统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果,有的可以说就是在传统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很正常,因为真正能站得住的新理论、新方法总是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是不存在的。

但是在西方语言学史上也的确发生过多多次新兴的学派在崛起的初期用“大批判开路”，全盘否定前人成就，说了不少过头话的事实。不过新兴的语言学流派不管在初期怎么尖锐地“批判”当时的主流派，事实上还是继承了前人所有经过时间和历史考验的成就，所以才能在新的高度上发展了语言科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的时候就宣称语言学只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在他们以前没有语言学，至少没有称得上科学的语言学。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以斯威特和叶斯柏森为代表的习惯语法学派兴起的时候就把传统语法贬得一无是处，批评传统语法根本不符合英语的语言实际，还举出好些批评传统语法的著名例句，如明明英国人都说“It is me”（“是我”），而学校老师教的传统语法硬性规定学生要说“It is I”，因为根据拉丁语语法“我”在这个句子里应该用主格，而主格当然应该用“I”，不应该用“me”。斯威特和叶斯柏森都是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挨“批”的却只是当时的中小学语文课老师，在学术界根本没有发言权，而传统语法的创始人，如古希腊的狄奥尼修斯则早在公元前 1 世纪就去世了，也没法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说这只是 2000 年后英国人生搬硬套的过错，跟他创立的理论和方法毫不相干。但是经斯威特和叶斯柏森等著名学者一“批”，传统语法在学术界就一下子“臭”了，从此很多人就称之为带有贬义的“传统语法”、“规定语法”、“课堂语法”、“教学语法”等。应该看到，传统语法在西方已经经历了 2000 年的历史和实践的考验，并没有真正被“批倒批臭”，所以直到今天西方国家的母语和外语教学，包括美国对外国人的 TOEFL（托福）考试，以及其他国家学习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用的还是传统语法，因为像上面举的那样“荒谬”的例子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要纠正也很容易，动摇不了传统语法的理论和方法。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法兴起以后，又宣称在他们以前根本没有语法研究，语法研究是从他们开始的，把他们以前的语法研究全盘否定，一概贬之为“传统语法”（还包括把传统语法“批臭”了的习惯语法在内），甚至说他们以前的那些语法只是真正的医学诞生以前江湖郎中的放血疗法，真正的天文学诞生以前的占星术和真正的化学诞生以前的炼金术而已。50

年代后期生成语法兴起,大肆宣扬这是语言学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又把当时的主流派结构主义描写语法贬得体无完肤,说结构主义描写语法能解决的,传统语法早就解决了,而传统语法已经解决的很多问题,结构主义描写语法却还解决不了。可是生成语法实际上是在结构主义描写语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兴的学派为了要在学术界争取一席之地而向主流派发起猛烈攻击,以致有时措辞有失当失实之处,也许正像新生儿的大叫大嚷一样是可以理解的。在西方语言学界,不同学派之间,甚至同一学派的不同语言学家之间,或者由于学术观点不同,意见有分歧,或者完全出于学派和个人的偏见,互相指名道姓公开批评和指责对方的观点和结论的事是司空见惯的,往好里说,这叫“学术自由”,往坏里说,有点像“不正当竞争”。不过,即使在西方,也已经有人指出语言学界这种现象有失学者风度,是语言学界不同于其他学术领域的一大缺点,不值得效法。不过在西方国家,失实和失当的批评和指责一般不会影响被批评、被指责的一方的工作和生活,更不会阻碍语言学的发展,因为挨“批”的人可以反驳,可以反批评,也可以不予理睬。但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并且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也有所不同,甚至很不相同。中国自古提倡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所以学者之间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一向是比较文明的,至少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例如1938年到1943年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就还比较“文明”,没有过激的言论,只是说过去的汉语语法是“模仿”西方的,他们要根据汉语的特点加以革新,缺点是他们对“模仿”和“改革”这些概念没有明确界定,因为他们改革的理论依据也还是西方的,只不过是西方的新理论而已。至于作为这次文法革新讨论的对立面的黎锦熙先生则没有加以理会,没有发表任何反批评的意见,但是教授照当,在各个师范院校黎派语法照“教”不误。可是从5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50年代关于汉语语法问题的几次大讨论,一开始应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是不同观点和不同意见之间的讨论和争论,但是不久就变成了“围攻”和“批判”,学术争论不知不觉演变成了“准政治斗争”。当时挨了“批”

的学者虽然还不至于“降级”和“下放”，但是在学术界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被“孤立”起来了，这就大大地伤害了这些学者的感情。到了1957年“反右”和十年动乱期间，那就完全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再也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了。谁要是在学术上挨了“批”，即使是“批”得完全没有道理，甚至完全没有根据，这个人就一切都完了，不要说名誉地位，连身家性命都难保了。这一段历史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也正是从50年代起，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在学术界，包括语言学界，逐步形成了一种什么都绝对化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认定：真理只有一个，既然研究的是同一客观事物，那么只有一个符合这一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的理论，其他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就都是错误的，因此不容许有不同意见。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人人都认为自己发表的意见是反映了客观规律的，因而是绝对正确的，是唯一科学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发表或坚持连自己都认为不正确的意见，结果就很自然地认为不同的意见都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这样一种思维定势真是害人不少，但是由于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在妨碍我们开展平等、友好、公开的学术讨论。吕叔湘先生在1981年哈尔滨教学语法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就是针对这种妨碍正常的学术讨论的思维定势的，他说：现在有人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唯一科学的，别人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如果另外还有一个人也认为只有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唯一科学的，那么你就不是“唯一”的了！吕叔湘先生说得很好，因为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不消除，事事处处都要“说一不二”，那就无法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同一客观对象应该允许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目的、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研究，不能说只有一个角度、一种目的、一种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唯一科学的，其余的就全是错误的，例如，只能说“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不能说“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或者别的什么；语法研究只能从形式着手，不能从语义着手；只有研究语言本体的结构系统的才是真正的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其他方面的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只能入“另册”，如此

等等。我们的思想完全僵化了。当具体问题的研究出现分歧意见的时候也要分个正确和错误,其实很难说一方对了,另一方就一定错了;可能两种意见都对,只是角度、适用范围等不同而已;也可能两种意见都错了;还可能一种意见对了百分之八十,另一种意见对了百分之五十。一定要分个正确和错误,而且一定要“说一不二”,如果认为一种意见是正确的,那么跟这种意见不一致的就一定都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这样一种绝对化的思维定势加上“大批判”的后遗症,正常的学术讨论和争论就无法开展了。

1978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初期有些讨论的“火药味”还是很浓的,“大批判”风格的语言并没有绝迹。在学术讨论中采用歪曲对方的理论,然后再加以批判和奚落的不正当手法的现象依然存在。令人更为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人认识不到这种手法是不正当的,有时候还在津津乐道地作为典范来引证。后来多数人也许是吸取了教训,“大批判”就慢慢寿终正寝了。这以后,“大批判”绝迹了,可是连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也绝迹了。这种表面的平静并不等于语言学界在理论和方法上、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已经没有分歧,意见完全“一致”了,也不等于那种绝对化的思维定势已经彻底消除了,事实上只是采取了另一种相反的表现形式而已,内心还是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不同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只是不说出来,不公开发表出来罢了。现在大家尽可能说“好话”,那样才不至于伤感情。这本来也许并不是坏事,因为要消除几十年来造成的心灵上的创伤,要改变几十年来养成的思维定势,本来就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由于绝对化的思维定势没有改变,在内心还是把不同的意见认定为错误的意见,不承认是不同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的反映,因此就更加不好办了。这就是说“后遗症”还不轻,说到底,还是不容许有不同意见,还是要处处“说一不二”,而学术上的“大一统”从来不是好事,多样化和百家争鸣才能促进学术发展。

尽管近20年来很少开展公开的、正常的学术讨论,但是语言学界并未真正风平浪静。

1980年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讲了一段关

于“钱”和“钱串子”的话，意思是：如果既有材料又有理论，最好；如果两者不能得兼，他宁肯要材料，不要空头理论。这一席话多数老年学者赞同，多数青年学者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反对理论研究，也是压制青年人从事理论研究。青年学者认为，现在的问题就在理论本身，所以应该先解决理论问题，然后再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果不先解决理论问题，还按过去的理论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维护传统理论的权威，那样就根本不可能建立新的理论，推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另外，双方对什么是“理论”和“理论研究”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好几位老一辈的学者在不同的会议上都讲过，他们认为只要是能指导实践，解决具体问题的规律就可以说是“理论”，揭示这样的规律的研究就是“理论研究”，而堆砌新名词、新术语，不进行具体语言的研究，不解决具体问题，就理论谈理论，不能算是“理论”和“理论研究”。老一辈的这种看法不能说不不对，因为任何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又回过头来指导实践的；不从事具体语言的具体研究是不可能建立起一种能指导语言研究的理论来的。可是不少青年人有不同的看法，青年人的看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任何实践都是受一定的理论指导的，所谓纯客观的描写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任何理论，那就连怎么搜集材料、搜集什么样的材料都不知道了；而所谓不要“空谈理论”，实际上就是要维护传统的理论。他们认为传统理论并没有解决中国语言学的问题，所以应该首先在理论上进行革新。他们中间相当数量的人也并不赞成搞“空头理论”，但是他们更强调理论，要先解决理论问题，再搞具体研究，并且不主张整天钻在材料堆里搞“归纳”，而主张“演绎”。我们不想在这里评论谁是谁非，因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双方都并不十分了解对方的情况，这是因为由于种种原因，语言学界内部的信息很不灵通，不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的人互相很少来往，即使在同一地区，青年学者和老年学者之间的来往也不多，互相缺乏了解，缺乏沟通，因此都有点以偏概全。

80年代初期学术界刮起了一阵否定过去一切成就的旋风，在

不少青年人中间形成一股“热潮”。语言学界也有个别的青年学者公开宣称在他们以前的中国语言学没有任何成就可言,都是“抄”西方的,真正的中国语言学只能从他们那里开始。稍后又究竟应该“重语言事实描写”,还是“重理论创新”,应该“重描写”、“重归纳”还是“重解释”、“重演绎”的议论。不过这些议论大都只是在沙龙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公开发表,因为多数语言学刊物不发表这一类文章。由此又引发了不少青年学者认为他们处处受压制的意见,认为“把持”这些刊物的老年学者是“学霸”,不让他们发表意见。同时,老年学者对某些青年人也有看法,认为他们“光说不练”,专放“空对空导弹”,写的文章还经常有“硬伤”。这样,双方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关系就不必那么紧张。青年人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是常事,让他们去说,没有什么关系,并且还有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让中老年学者的头脑清醒一下,不要过于自满,认为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而要认识到我国语言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还不那么理想,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可以设想,如果已经有了一种真正符合汉语特点的理论和一整批可以满足社会各方面需求的具体成果,那就很可能不大会有人发表这样极端的意见,并且不可能一时得到这么多青年人的共鸣和响应了。当然,从青年人这一方面来说,话不必说得这么“绝”,特别是个人有些话近乎人身攻击,这就超出了学术讨论和争论的范围。至于青年学者的文章不容易发表,原因很复杂,不排斥有的老年编辑有成见,或者不很了解新理论、新方法的情况,但是总的说来还不能说是所有的语言刊物都在有意“压制”青年学者。至于究竟应该“重描写”、“重归纳”,还是“重解释”、“重演绎”的分歧恐怕永远解决不了,因为“归纳”和“演绎”永远是科学研究的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方法,恐怕很难说哪个绝对正确、哪个绝对错误。实际上老年人也并不是完全不重视理论,他们对同时代的新理论的关注和理解恐怕超过了现在的青年人。青年人也并不是都不从事具体语言的具体研究,这些年来一本本著作的出版就是明证。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必要争个高低,也没有必要“统一思

想”，不妨各行其是。

到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似乎多数人都冷静下来了。应该认识到，在任何一个学术领域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有不同意见，只要实事求是、平等待人、相互切磋，就能相互补充、促进学术繁荣。如果大家的意见都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分歧，那岂不是只需要有一个人去研究就够了，其他的人就全是多余的了。但是一切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如果双方不熟悉，背景情况了解得又不那么确切，“提不同的意见”跟“批判”、“压制”往往只有一步之差，更何况“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是常有的事。那么怎么来消解各种误解和矛盾而同时促进自由讨论，创造一个百家争鸣的宽松环境呢？我们呼吁“理解”和“宽容”。要互相理解：青年学者要理解老年学者，理解他们那个年代的历史，理解他们遵从的理论和方法，还应该学习他们取得的成就和严谨的学风，而不要认定他们都是老顽固，都不了解新理论、新方法，还要压制新生力量；老年学者也要理解青年学者，要理解时代的差异，要理解这一代青年学者的特殊性，要理解他们愿意在这一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的真诚愿望，因此要更多地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而不要盯住他们的缺点不放，而且也应该想到现在的确有很多新理论和新方法自己并不了解，青年人的文章只要有一得之见，能自圆其说，就应该支持发表，如果有一两处“硬伤”，提醒作者改一改不就行了嘛。特别是主持刊物的老年学者更应该在一视同仁的基础上对青年学者多加关照，千万不要因为青年学者写的文章的观点跟自己不一致，风格不合自己的口味，就看不下去，何况编辑部也并没有责任对作者的观点和结论负责。在一个刊物上如果有两种对立的理论和观点展开自由讨论和争论，有关问题的研究就越容易深入，越容易接近解决。学术上的“清一色”并不好，相反，是学术进步和繁荣的大忌。但是，“讨论”也好，“争论”也好，方式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措辞一定要有分寸。要充分考虑我们的国情：不少人还“心有余悸”，不少人还不习惯听直统统的批评意见，更多的人还害怕公开指名道姓，那么我们就多讲究一点方式方法。也许再过 20 年，我们可

以无拘无束地进行争辩而不至于伤感情。现在，恐怕还不行，还很需要讲究方式方法。

我们认为老年人应该对青年人多几分宽容。青年人有犯错误的权利，因为他们是青年人！谁在青年时期没有犯过错误，没有写过一篇有错误的文章？别人的情况我不很了解，我在1954年就发表过“大批判”文章，批了高名凯先生，也批了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至今回想起来还脸上发烧。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老了，就对青年人这么苛求呢？“严谨”和“谦逊”是中国语言学界传统学风的两大特色，但是我们主张要“严谨以律己，宽容以待人”，千万不要“宽容以律己，严谨以待人”。特别是对青年人要宽容。这是因为中国又是一个有“敬老”传统的国家，老年人一说话，青年人就不便发表不同意见了，所以老年人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和中青年人在一起，说话要讲究分寸。青年人对老年人也应该多宽容。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老年人容易倾向保守，容易倾向墨守成规，当然也不能绝对化，一概贬为“老顽固”、“老保守”。老年人已经习惯于自己过去的思路和研究方法，认为到目前为止，对汉语的语言事实还描写分析得不够，还必须做大量具体的描写分析工作，那就让他们和一部分同意这种观点的人去描写、去分析。这也是尊重他人的“自由”。青年人有一股冲劲，要有所作为，这是青年人的长处。但是青年人往往考虑不周全，说话喜欢拣“尖端”的话说，难免得罪人，老年学者不必计较。另一方面，在一个“敬老”的社会里，老年人似乎有“资格”随便一点，所以完全有可能在某些场合说话也欠考虑，或者是以偏概全，或者是让人觉得态度有点盛气凌人，青年学者也要有雅量，原谅他们。好在现在已经不是“大批判”年代，说几句不恰当的话，对双方的工作和生活都不会带来什么影响，完全可以不必计较。

国内学者和海外学者也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宽容。国内学者，特别是老年学者，常常要提到所谓“三个例子写六百页的书”，而且这三个例子里有的还站不住的现象，很不以为然。中国语言学有乾嘉学风的传统，赞赏六百个例子写三页书，而且“无一字无来历”。这话有点过分，不过处处要求“严谨”也不能说完全不对。